

在借鉴与依附之间

——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反思

林莉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在移植与应用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客观地存在着有针对性的借鉴和无原则的盲目搬用两种形式。就当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我们应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高等教育理论,以有利于中国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为立足点,重视民族意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培养和弘扬,努力实现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关键词:借鉴;依附;高等教育;研究;文化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4)02-0066-05

Between reference and dependency

——A reflection on the research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LIN Li

(School of Higher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plan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high education theory of the West, exists objectively two kinds of forms, that is, one is pertinent reference, another is unprincipled copy. As regards the present situation, we should study positively and learn actively from the advanced high education theory of the West, take stand of developing the research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pay emphasis on the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national pride, self-confidence, and try hard to realize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western high education theory.

Key words: reference; dependency;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culture

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少西方高等教育的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国外一些流行的高等教育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并引起国内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与研究,大批中国学子留学海外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的学习与研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以英文撰写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并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对乐观主义者来说,这些变化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繁荣与进步的象征,他们呼唤并赞

美这种现象;而对悲观主义者而言,这些变化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对西方学术中心的依附,他们为此感到焦虑与不安。那么,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而言,这种变化到底是一种真实的发展,还是一种虚假的繁荣?面对这种变化,我们该采纳乐观主义的态度,还是该支持悲观主义的立场呢?在我看来,对上述变化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收稿日期:2003-12-24

作者简介:林莉(1977—),女,福建龙岩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

在中国大陆,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产生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土生土长”,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开始具备了与西方高等教育研究进行对话的条件与能力。上述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的变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20世纪90年代日渐凸显的。这些变化,说到底还是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的移植与应用问题。在移植与应用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客观地存在着有针对性的借鉴和无原则的盲目搬用两种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造成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分歧所在的原因之一。

有针对性地学习与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理论,既有必要性,也有合理性,还有先进性。它既有助于我们预见本国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也有利于我们在解决高等教育问题时借鉴合理、有效的方案和措施;既有助于我们吸收当前西方先进的高等教育理论,也有利于我们独立自信地与西方高等教育理论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但是,在学习与借鉴的过程中,“度”的把握十分重要,把握得当,相得益彰;把握不当,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则很可能陷入对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盲目学习和搬用的境地。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度”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能说得清道得明的问题,理论上尚且如此,反映到实践中,则更是五花八门,无从规范。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强调“批判地吸收”,呼吁“既要积极开放,又要防止全盘西化”,但一涉及具体问题,尤其是利益问题,每个人又都可以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对“有针对性地借鉴和学习西方高等教育理论”作出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受个人利益所左右,在对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的任意取舍中导致了“有针对性地借鉴”的名实不符。举个例子,一项对中国(包括大陆和港、台)留学北美主修社会科学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选题方向的调查显示,选择本土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占大多数;选择西方与其他非本土社会的占少数;选择西方与本土社会情况作比较的占少数;选择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作有系统的追查及评审的完全没有。^[1]这里有一个问题颇值得思考:自介式研究成果的主要享用者是谁?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根据西方对情报资料的兴趣,尽量收集本国的种种材料,在洋教授的指导下,竭尽所能地去做整理和诠释的工作,撰写成以大陆或台、港为题材的论文,然后毫无保留地向别人奉献,以获取博士学位。难怪有评者一针见

血地说,留学生只提供了中国社会从政治、财经、军事、教育以至工商、科技的情报和数据,可称为学术“进贡”,如此而已。这些归国的留学生,不仅未学来西方的先进理论,反倒在做一些对他人有用,对国人无益的研究。他们既不能通晓西方的学说,又怎能对西方学说作出批判、选择和借用呢?这不是与通过留学海外来学习和借鉴西方理论的初衷相去甚远吗?这种现象与我们前面所说的个人利益有什么联系?细究内里,我们发现,正是留学者对自我利益的强调,导致了“借鉴”的名实不符,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历史学家赖世和所做的另一项研究中得到验证。赖世和通过对中、日留学生心态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留学生和日本留学生到西方国家留学的心态有很大的不同,日本留学生是问题取向的,而中国留学生则是地位取向的。也就是说,到西方国家学习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最关心的是如何快速地获得学位,并以之作为工具,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这种“以学位换地位”的利益动机的驱使下,他们在留学期间往往不是想真切地理解西方,而是在了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一点皮毛之后,用本土社会中的各种资料加以验证,写成英文论文,快速地取得学位。这就难怪一些留学归国人员在研究问题时,往往只是稍微改变研究方法,或变换一下研究对象,便向有关机构申请研究经费,然后,不断反复地做类似的实证研究。^[2]反映到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这种研究倾向不仅会直接间接地妨碍本民族高等教育理论的发展,更危险的是,久而久之,将造成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界的自我迷失和对西方的依赖。

其实,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活动中容易让人将有针对性的借鉴和无原则的盲目搬用相混淆的现象很多,导致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也多种多样,本文开篇所提及的种种高等教育研究的新变化,都既有可能是有针对性的借鉴,又有可能是无原则的盲目搬用,关键在于“度”的把握。而这个“度”如何把握,应根据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实际需要而定。就当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我们应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高等教育理论,在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以有利于中国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为立足点,重视民族意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培养和弘扬,努力实现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变化,如果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分歧仅止于此,那么我们的讨论或许就会简单许多,并且也还有理由对讨论的结果表达某种程度的乐观。但事实上,在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的移植与应用过程中,借鉴与依附之间的关系

问题,是一个比有针对性的借鉴和无原则的盲目搬用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宽泛、隐蔽,也更为重要的问题。中国对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的移植与应用,是借鉴的成分多一些,还是依附的色彩重一些,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可能才是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根本分歧所在。

二

对于西方的高等教育理论,无论是有针对性的借鉴,还是无原则的盲目搬用,实际上都包含着这样一种预设:是出于本土高等教育及其研究发展的实际需要,我们才主动地从西方引进先进的高等教育理论。尽管在引进的过程中有可能会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形式上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学习,而非消极、被动的接受。总之,是借鉴,而非依附。如若对中国高等教育及其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一番冷静分析和考察,我们会发现,这种形式上的积极主动,很可能是以对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的被动迎合与自身的主动转型为代价的,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前面说过,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研究生于本土长于本土,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经验多于创造,革命性大于学术性,却是勇气可嘉。正是在这样一个不太成熟的研究领域,理论界用10年左右的时间与世界交流并在交流中发现了自己的差距,于是中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界在此10年间匆忙地了解和学习西方的高等教育及其理论的发展。作为一项艰巨的学术研究工作,学习和借鉴西方的高等教育理论是需要包括知识、方法等一系列学术积累及文化传统作强大后盾的,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正是在这些方面缺乏强大的支撑,因而在借鉴与依附之间摇摆不定。在悲观主义者看来,这很可能是中国(包括大陆及港、澳、台)在发展高等教育理论时,很难克服的一个根本问题。

就中国大陆的情况而言,导致我们在学术和文化支撑上的缺失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高等教育的依附发展。依附发展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教育现代化初期表现出的一个共同趋势。我国高等教育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中,客观地存在着学日、仿美、搬苏的现象,依附发展的特征十分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阶段:(1)鸦片战争以后到1949年以前,中国高等教育逐步突破传统的高等教育模式,在欧风美雨的环境中

获得依附发展;(2)1949年到现在,中国高等教育与工业化的需要相关联,在冷战及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依附发展。^[3]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依附特征,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依附。中国现有的高等教育制度可以说是国外高等教育制度的翻版和复制后的杂糅,“与高等教育的‘大陆模式’、‘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和‘日本模式’相比,直到目前,也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模式”^[4]。高等教育制度是一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根基,中国高等教育根基的不稳固使得根基之上的高等教育研究也必将陷于风雨飘摇之中,因此,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解释就难逃依附的窠臼。正如有学者比喻的那样,西式学校教育的传入是西方世界打入我们文化传承体系中一枚永久的楔子。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变迁而非因素变迁,使得我们在解释自己民族的高等教育甚至传统文化时,却不得不应用西方的分析框架和话语体系。^[5]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说,当前的世界是一个以西方,主要是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从工业革命以来一直保存至今,中国不可避免地处于该世界体系之中。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落后决定了中国只能处于这个世界体系的外围或边缘,这使得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的(高等)教育及建基于其上的高等教育研究难以进入世界学术体系的中心,从而极易被贴上“学术边缘”与“依附”的标签。

第二,学科的西方中心主义与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现状。当前的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几乎都是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基点之上延伸和发展的,基本理论与分析方法也是如此,否则就往往被认为“不是科学”。当研究对象在上述两个基点之外,则面临诸多的理论与方法的困惑和无奈。例如,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在规模数量急剧扩张过程中“质”的变化情况,如果按西方的大众化理论中“质”的11个纬度,就很难解释中国高等教育在“质”的方面表现出的种种特征,这就迫使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学者探索新的分析理论和评价方法。如果说“破”还容易的话,“立”则要难得多。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意识较强但视野不宽、经验总结与理论提升不足、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重思辨方法轻实证研究、研究队伍庞杂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去“立”。“立”之所以要难得多,另一方面还在于高等教育学受学科本身特性的限制。我们知道,多学科研究被认为是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但是在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进行高等教育研究时,我们将面临这样一

种状况:无论是高等教育赖以依靠的教育学和心理学,还是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必不可少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现代社会科学几乎全是欧美学说的产物。在中国,这些学科从其产生之日就由西方引进,直至今日我们仍在源源不断地移植西方的理论。这些学科如果去除了西方的学说,几无内容可言。因此,我们在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对高等教育进行研究时,就等于是用西方的学说来对高等教育作出解释。从上述意义上说,我们的知识、学识、功力以及学科特性,使得要摆脱学科的西方中心主义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

第三,高等教育研究人员文化主体性的迷失。自鸦片战争以后,在外来压力的作用下,中国社会被迫踏上了现代化的进程。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及在科技和经济发展上的落后,使得中国长期以来把西方先发内生型的现代化国家视为自己的榜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自我文化殖民的心态。这种自我文化殖民心态配合西方国家有意无意的文化殖民,以及研究者对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权力关系的漠视或无意识,加上学术研究中一贯存在的普世主义传统——对真理的超国家的理想追求,导致了以比较高等教育研究者为代表的高等教育研究人员文化主体性的迷失。这种文化主体性的迷失是一定时代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人员所从事的研究,阻碍了他们以真正平等的心态同国际高等教育学术研究进行跨文化的平等对话。

三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要真切地了解一个问题,一定要追溯到历史上第一批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的提问。就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来说,上述变化只是近10年的事,而由上述变化所带来的问题似乎直到最近才引起人们的重视。虽然我们暂时无法对这些问题作出哲学上的追溯,但在现存的理论中,曾经风靡一时的依附理论或许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对上述问题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

依附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拉美为代表的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理论家和西方一些激进派批判西方现代化理论时所运用的重要分析框架,其主旨在于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示向。作为一种理论范式,依附理论有如下基本观点和概念:(1)在社会发展的内、外因关系问

题上,依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从根本上来说是发达国家剥削和侵略的结果;(2)在理论框架上,依附论学者系统地建构了一个“中心——外围”的理论体系;(3)在发展出路上,依附理论为发展中国家设计了种种走向现代化的可能路径。总之,依附理论在揭露和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方面,在引起人们对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关注方面,在帮助人们从经济、政治、社会角度理解“发展”的真正含义等方面,作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但由于依附理论自身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依附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转入低潮。

将依附理论的分析框架运用于教育发展研究的集大成者是美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菲利普·G·阿特巴赫。他在《比较高等教育论》、《比较教育》、《第三世界国家的高等教育》、《从依附走向自主:亚洲大学的发展》等书籍和《作为中心和边缘的大学》、《思想的奴役:教育、依附和新殖民主义》以及新近发表的《学术殖民主义在行动》等论文中,运用“发达”与“欠发达”、“中心”与“边缘”、“文化帝国主义”等作为分析的框架,“把大学分为‘有影响力’和‘从属’的两类大学,也就是把大学分为知识的创造者和知识的传播者,前者在国际学术网络中居于‘中心’地位,而后者则居于‘外围’地位。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学术模式总是从中心向边缘传播的,而第三世界的大学尽管在其本土内具有影响力,但在国际学术网络中仍居于劣势地位”。^[6]依附理论在教育中的运用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教育结构及教育内容是中心对边缘进行控制的基本手段,发达国家通过将本国教育结构和教育内容输入发展中国家,来复制一些适合它们(指中心)继续生存甚至壮大的条件。这些手段的运作方式不仅有公开的,而且也以极巧妙的方式默默进行。(2)思想控制的过程极具影响力,因此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进行思想控制。在发达国家优势意识形态的强大压力下,发展中国家人民在思想和文化的选择上无法进行独立的判断或抉择。(3)只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联系,想通过教育或教育改革来促进发展中国家进步的可能性就不存在。只有同中心支配权力断然决裂,发展中国家才能通过教育或教育改革促进自身的发展。(4)一个国家的依赖程度愈深,其在建立有效的社会及教育制度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将愈大。

作为盛极一时的理论观点,教育依附理论深深地影响了一大批高等教育研究者。发达国家的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其作为“国际

学术中心'研究者的观念、立场和自我意识。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来说,如果毫无批判地接受教育依附理论,无疑将使本国的高等教育及其研究朝着依附的方向越滑越远。

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是否依附于西方的高等教育研究呢?

诚然,如果将依附理论及教育依附理论的各种论点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实际情况相比照,我们会发现,教育依附理论具有某种程度的解释力。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以下几点:

第一,与自然科学所追求的价值无涉不同,高等教育学是作为一种价值学科和文化理论而存在的,它的研究对象——高等教育活动的地域、民族特征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正如康德所言,“由于教育主要代表社会的一种有意的努力,即社会保存那些它认为对它的持存来说十分珍贵和根本的东西的努力,因此,教育的本性和组织显然必定要受到一国民族特性的强烈影响,并为这一民族无数其他因素所模塑”^[7]。高等教育学要研究和认识本民族国家的教育活动和教育现象,自然无法回避其民族性的问题,必须立足于本土思想文化、生存经验及与其他民族的区别之上。这种民族性会自然地潜藏与反映在高等教育研究者的思想以及作品中,并在中国社会大环境及高等教育的火热实践中得到不断强化,最终必将以强大得多的力量战胜同样潜藏于研究者思想中的自我文化殖民心态。

第二,与教育学移植于西方不同,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自身的发展是以“土生土长”为前提的,它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现实起点。在这一起点之上,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普遍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多数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探讨高等教育发展中与时俱进的现实性问题,针对性较强。这使得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与中国本土社会的现实和教育实践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直接且积极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增强了源自于本土的高等教育理论改变现实生活的力量,同时也赋予了我们解构高等教育研究中“西方中心主义”的力量。在学术界越来越强调“教育学中国化”并为之努力的今天,“中国高等教育学本土化”因其具有的天然优势,必将超越于对西方的依附,构筑起自身的学术特征和价值。

第三,与西方高等教育的“问题研究”取向不同,中国高等教育学在初创时期便是以学科建制为特点的,尽管其间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但中国高等教育学

“在学科建设方面走在了前面”^[8]。此外,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在队伍建设方面,在对高等教育发展中诸如“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等具有开拓性、全局性的普遍规律的发现与把握方面,在研究成果给政策与实践带来的重大影响等方面,无不显示出有别于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种种特征。如果说“中国教育学与外国教育学是两种不同‘类型’之间的关系”^[9],那么,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与西方高等教育研究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研究。“它们以各自的文化传统为前提,产生于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之中,在各自文化范围之内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规范性,但是彼此之间不存在‘先进’和‘落后’,‘科学’与‘非科学’,‘现代’与‘传统’之分;有的只是在文化的限域内教育学理论与它为之服务的教育实践之间的适切性的问题。适应一种文化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教育学不一定能满足另一种文化的生存和发展。”^[10]

总之,在借鉴与依附之间,我们无法更为清晰地描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未来之路,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纷繁复杂的各种现象、关系和因素背后,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包括对本土高等教育的深入研究、从观念到形式上对西方学术和文化霸权的分析与解构、对本土文化资源的挖掘、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及其成果的反思,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遇到来自西方和本土社会的种种挑战,不管这些挑战能否成立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立,它都要求我们抱审慎的乐观与必要的忧患,以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来看待高等教育,看待高等教育研究,看待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

参考文献:

- [1][2] 杜祖贻. 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移植与应用[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社科教育理论应用研究计划出版, 1993. 204, 33.
- [3][6] 袁本涛. 论中国高等教育的依附发展[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0, (1).
- [4] 张珏. 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依附式发展的反思——谈学习国外高等教育的基本经验[J]. 现代大学教育, 2002, (3).
- [5][7] 项贤明. 比较教育学的文化逻辑[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前言) 3, 240.
- [8] 高宝立.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进展、问题与前景[J]. 教育研究, 2003, (7).
- [9][10] 石中英. 教育学的文化性格[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350.

(本文责任编辑 许宏)